

回首话当年

回忆文章

——对李朋同志领导杂志社工作的片断回忆

□ 钱度龄

光阴荏苒，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已经三十年了。回首往事，情不自禁地想起李朋同志。在杂志社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做为分管杂志社的副部长，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杂志社成立初期，李朋同志领导杂志社工作的一些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

1981年11月，财政部党组决定将原属办公厅的财政编辑部和财务与会计编辑部从办公厅分出来，成立杂志社，并确定李朋副部长分管杂志社的工作。杂志社成立后，需要刻印章，马上就遇到一个叫什么名字的问题。当时我们商量，想仿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叫法，叫财政部杂志社。我们将这个意见向李朋同志汇报后，他想了一下说，还是叫中国财政杂志社好，以后有些活动可能方便一些。后来经过部党组同意，杂志社就定名为中国财政杂志社。

杂志社成立以前，《财政》和《财务与会计》两个杂志是由两个编辑部编辑，经部办公厅领导核转分管办公厅的副部长审阅签发后，交由财经出版社出版，由邮局发行。财务核算归财经出版社，出版社定期给两个编辑部一些编辑费，用于编辑工作中一些必需的开支，如购置工具书等。当时两个杂志由出版社交给北京市所属的一家印刷厂印刷，遇到北京市召开一些重要会议，印刷厂忙于印刷会议文件，常把杂志的印刷拖后了，杂志

经常脱期，读者反映意见较大。杂志社成立后，社里的同志希望更换印刷厂，由杂志社自己出版杂志。但是财经出版社对此有不同意见，希望继续由他们出版。我们把这些情况和意见向李朋同志汇报后，他同意杂志社的意见，但因牵涉到两个单位，他不便决定。一天，他约同分管财经出版社的陈副部长和财经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并叫上我，一起去向王丙乾部长汇报，请王部长定夺。听了情况和意见的汇报，并同两位副部长商量后，王部长同意两个杂志由杂志社出版。这个问题解决后，接着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当时邮局是在每个月的月底将当月杂志的订费扣除邮局发行费后划给出版单位的，而出版单位在杂志开印之前就要购买纸张给印刷厂。两个杂志由杂志社更换印刷厂出版以后，杂志社在收到邮局划给的订费之前就需要一笔资金购买纸张给印刷厂，而杂志社手无分文。因此我当即提出这个问题，希望部里能给杂志社一笔流动资金。王部长听了以后，决定由部行政司先借给杂志社一笔钱，用于购买纸张，杂志社以后由订费收入中归还。从此以后，杂志社接手了杂志的出版工作。从财务经营来说，杂志社就是由这一笔借来的资金起步的（后来杂志社如数归还了行政司这笔借款）。

杂志社成立后，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作法，把每一期杂志的稿件全部

送请李朋同志审阅签发。他对我们说：“现在成立杂志社了，杂志应该主要由你们来定稿。以后你们只要把每期杂志的目录和一两篇主要论点的稿件或者你们拿不准的稿件送给我看，其他由你们来定。我认为你们应该、也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你们大胆地去工作，如果以后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来承担责任。”从此以后，我们就照他的这个意见送审稿件，这也更加重了大家对工作的责任感。

原来两个编辑部已经在各地聘请了一些通讯员，开展了通联工作。1983年秋天，杂志社在山东省胶南县召开了部分通讯员座谈会。会上大家在交流通讯员工作情况和经验、评议几年来两个杂志的内容并提出改进意见的同时，强调了通联工作对办好杂志的重要性，建议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成立通讯组，进一步加强通联工作。会后我们向李朋同志汇报座谈会情况，他很赞同座谈会上的一些意见，以财政部名义把座谈会纪要批转各省（区、市）财政厅（局）。随后，他又让我们代部起草文稿通知各省（区、市）财政厅（局）成立两个杂志的通讯组，并定期将通讯员和组长名单报杂志社。在各地通讯组名单报齐以后，1984年春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区、市）通讯组长会议。会前我们向李朋同志汇报会议准备情况，他主动说：“开会时我要到会讲话。你们认为我应该讲些什么，希望我讲些什么，你

们提出意见,但发言稿不用你们准备,我自己写。”会议的第一天,他到会就财政经济形势和如何办好两个杂志讲了话,与会同志反映很好。以后,各地通讯组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财政》杂志的内容虽然包括税务,但总是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同志特别是税务部门的同志希望能再有一个税务方面的专业杂志。杂志社的一些同志也有这个意见。1984年上半年,我们向李朋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建议再办一个税务杂志。他同意我们的意见,让我去和当时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金鑫同志商量。金鑫同志也很支持。随即税务总局和杂志社联名给部党组写报告,建议创办《中国税务》杂志,由杂志社编辑出版,杂志稿件在税收业务方面由税务总局把关。经部党组同意(并经文化部同意)后,在税务总局的大办支持下,杂志社成立了《中国税务》编辑部(税务总局调给了五位同志,包括一位编辑部副主任)。经过一段筹备工作,《中国税务》杂志在1984年10月创刊面世,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各地税务干部的欢迎(后来财政部税务总局改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税务局,1988年8月,《中国税务》杂志划归国家税务局主办,杂志社《中国税务》编辑部也成建制地划归国家税务局)。

1985年春天以后,由于部党组同志分工的调整,李朋同志不再分管杂志社了,但他仍然关心和支持杂志社的工作,杂志社的一些重要活动,如1986年7月纪念《财政》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他仍然来参加。往事历历,恍如昨日,而李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作者为中国财政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

回顾与展望

——为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30周年而作

□ 郭代模

1990年6月16日,我带着许毅导师“工作要干好、学问不能丢”的叮嘱,由财政部科研所黄菊波副所长陪同,来到中国财政杂志社报到。6月19日正式开始工作,直至2005年8月退休。这一干就是十五年。在这五千五百五十多个日子里,我把自己的人生中最富精力、最有激情的黄金时段,献给了财政会计宣传、编辑、出版事业。回首这些难以忘怀的岁月,我又仿佛置身于杂志社之中。

一、对工作的认识既要有高度,又要有深度

能不能适应工作、胜任工作,首先有一个对工作的认识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指对财政宣传工作的认识。此前,我在财科所工作时,曾与余天心同志联名,给财政部党组写信建议创办财政部自己的报纸,强调办好一张报纸,对于做好财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墨迹未干,我就被一纸调令派到杂志社做编辑出版工作。我深深了解这一工作的责任及其使命。我认为,杂志社的工作,既是我国财政事业的组成部分,对财政改革发展有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其政策性和专业性是很强的,因此,在工作中务必始终坚持服务中心、服务现实、服务读者的办刊兴社方针;又是党和国家宣传事业的组成部分,事关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在工作中务必突出发展、突出改革、突出特色。我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大的方面看,我们专题研究过如何提高刊物质量问题,如何扩大刊物发行问题,如何强化经营管理问题。从小的方

面看,我们积极参与组稿、采编、审稿,同时还最大可能地写好每一篇社论、评论,每一篇诗词等等。总之,刊物的内容与形式都在与时俱进。前者,烙下的是改革开放的痕迹,后者则在潜移默化中变得丰富多彩了。而“两刊”的月发行量则曾经达到80多万份。

二、对工作的态度既要有战略思考,又要有战术把握

做编辑出版工作,有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它涉及方向性、政治性和原则性。换句话说,叫做有一定的风险。毛主席说的“政治家办报”,就内含着办报办刊的政治要求。其次,有全面的业务诉求,因为财政、会计从理论到业务,都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现实诉求,是理论、政策和业务相互渗透、互相作用的学科,而且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作为编者,既要有战略眼光、战略思维,又要在具体工作上有所把握。至于如何办刊?我曾经为《中国财政》创刊50周年、为《财务与会计》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写了两首小诗。前者曰:“请带上祝福前进”;后者为:“感悟奖杯”。这两首小诗较为充分地展示了我的内心世界与内在情感。作为编者,我为你耕耘着青春与生命;作为作者,我为你奉献智慧与珍品;作为读者,我为你掏出真爱与赤诚。当然,这两首小诗里,也较为生动地反映了我的办刊理念与实践,在“祝福”一诗中写道:

毛泽东指示“政治家办报”,
为你校正政治方向的准星;
小平同志的“硬道理”,